

古今呼应,东西对话: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独特意义

李平,杨政银

(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商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问题的提出

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范式亟需突破性转型,一是因为中国实践日益增长之独特需要的正向拉动,二是因为西方学术日益显现之独特盲点的反向驱动。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本土管理实践已经经历或正在发生重大与深刻的变化,这为进行本土研究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做出好的本土管理理论研究,不仅能够总结和传承组织管理实践者们付出艰辛获得的经验,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训诫,而且更能为未来的实践提供指导与启发,甚至为全世界的组织管理发展有所助益。

反观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范式管理学研究,已越来越显出其疲软与僵化的态势,表象是强调量化分析(例如,统计数据、数学建模),因此在精准碎片化分析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而在重大理论方面的突破创新却日益鲜见。这种状况甚至已引起西方诸多有识学者的深刻反思和尖锐批评。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西方知识哲学在后工业时代,日益暴露出其致命盲点及引领未来的无力感。这也是西方越来越重视东方智慧的根本原因。愈来愈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深入学习研究东方以智慧哲学为基础的视角,甚至比我们自己研究得还要深入。我们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再一次落伍(第一次落伍起始于几百年前西方文明的复兴),实在令人遗憾,也匪夷所思(第一次落伍是因为西方文明的优势长板)。

本土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是指,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并且以本土视角探讨其本土性(主位)意义以及其可能普适性(客位)意义的研究。“本土视角”是本土研究的核心,是本土研究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必要性不仅在于中国现有国情与西方有极大差异,更在于东西方在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与基本哲学上均相去甚远,因而生搬硬套西方管理概念与理论不仅是舍本逐末,还会水土不服。中国必须构建本土管理理论体系,形成独特的中国管理学派。

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对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独特意义有足够的理论敏感性。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以中国传统哲学与智慧为源头,应该“顶天立地”：“顶”传统哲学与智慧之“天”，“立”中国企业组织管理实践之“地”。也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哲

[作者简介]李平,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终身教授;杨政银,西交利物浦大学博士生。

学之中。通过与当下的管理实践相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也需要本身的现代化,需要自身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也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不能放弃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不能进行所谓的“西方科学化”。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不能也不应建立在西方哲学之上。如果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坚实的基础,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或“夹生饭”。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活水源头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本土管理实践的不竭源泉也在于中国传统智慧。但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也不应仅限于描述本土现象或本土情景,而必须超越本土的局限,要能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管理现象和情境进行研究与解释。西方哲学本质上是知识哲学,中国哲学特色本质上是智慧哲学,两者各具特色,应该积极对话,彼此相互学习,在求同存异中进行统合。

中国哲学的智慧内涵

中国丰富的历史及文化,特别是先秦哲学,为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及坚实的基础。中国智慧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成就。中国智慧哲学主要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道家,并吸收儒家等其他各家所长,以及后来的中国佛家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最为本源的基础在于道家,道家直接源于《易经》并影响《易传》,在时间上先于并且统领儒家和佛家。台湾学者陈鼓应在其2010年的专著《道家易学建构(增定本)》中有力地论证了“道家思想乃为《易传》对《易经》进行诠释所根据的最主要思想来源”。

中国智慧哲学由三大内容组成:“道”(即主客统一,天人合一)为本体论,“阴阳”(即正反双方相生相克)为认识论,以及“悟”(即直觉想象,以比喻类推为具体方法获得洞见)为方法论。换言之,作为本体论,“道”强调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作为认识论,“阴阳”强调整体、动态、对立统一之平衡;作为方法论,“悟”强调直觉想象,以比喻类推为具体思维方法。

阴阳思维具有三大规律性维度,即整体性,动态性与对立统一性。阴阳思维认为,矛盾的双方可以并且应该永远共存,矛盾不需要在更高层次上通过扬弃加以解决。没有矛盾就没有“道”,没有“阴阳”消长,没有天人同一(既同源同理同构同存)这一世间最为本源的规律。中国智慧哲学思维与西方思维存在根本区别,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先分后和”逻辑(both/or logic),与亚里士多德的“非此既彼”逻辑(either/or logic)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将“阴阳”思维称为“相生相克”逻辑(either/and logic)。

阴阳思维三大规律性维度对应的三大操作性维度,第一个是“不对称原理”;第二个是“相互转化原理”;第三个是“非线性原理”。阴阳思维的这三大操作性维度相互包含,相互影响,但也相对独立,各司其职。与阴阳思维三大规律性维度一样,阴阳思维的三大操作性维度也共享同一的主题:即相生相克,因而阴阳平衡。由此可见,“阴阳”思维与现今时髦的“二元论”(ambidexterity)观点具有根本区别。

悟性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核心思维方式之一,与阴阳思维方式及道思维方式并列为中国智慧哲学的三大内容。悟性思维方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以直觉为基础,以想象为媒介,用比喻推论手段产生深刻洞见的思维方法,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比喻推论的非概念非逻辑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悟性思维方式是采用跳跃式联想和比喻获得洞见的直觉想象,其核心内容是区别于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独特意象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悟性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与“阴阳”思维的整体观念互补;具有高模棱两可性,因此无法使用概念和逻辑。悟性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的想象力有关,悟性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洞见。悟性思维分为顿悟和渐悟两类。

中国智慧对现代管理的独特启示

中国企业的组织管理应该而且必须以中国传统哲学与智慧作为运作的底层代码和内在逻辑,而中国传统智慧与管理实践,又是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建构的最初起点。管理学领域向来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中国本土管理也不例外。中国当代企业与企业家们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智慧的应用,其用力之深、运用之妙、效果与效率之出彩,均非常令人惊讶与敬佩。他们一方面借鉴学习西方的科学管理模式,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流程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又为企业注入中国传统哲学与智慧,通过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激活,更进一步促进企业发展壮大,最终在兼收并蓄东西方长处的基础上,融汇创新,形成独树一帜的管理理念与模式。

海尔的张瑞敏对道家思想推崇备至,他把老子当作教会他战略思维的第一位老师,更是把《道德经》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柔弱胜刚强”当作他的座右铭。认为一个企业家首先需要具备哲学家素质的张瑞敏,可以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地道的道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家崇尚水,“海尔”的企业发展历程就是“水式管理”的典型代表。海尔从创业伊始的水滴,到凝聚为江河,再蓄势成湖海,然后升华为汪洋,最后回归到“人人都是 CEO”的水滴。道家水哲学在企业组织中的演化阶段与机制,在海尔的发展征程中得到了生动的演绎。

曾以“狼性文化”和“灰度哲学”引人瞩目的华为,是另一个运用中国传统智慧尤其是道家思想于现代企业管理,并取得大成的让人叹为观止的案例。在企业面临极其严峻的竞争环境,又要实现从中小型企业向大企业跨越式发展的阶段,强调严明甚至冷酷的组织纪律和拼搏精神,应该是所有企业的不二选择,这种“狼性文化”就是中国法家思想的体现。而法家的起源与道家和老子有很深的渊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认为法家主要创始人物的学说源于老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吸收道家思想基础上,将法、术、势糅合为一并对法治理论系统化。“灰度哲学”则明显具有道家阴阳的思想,“灰”是“不黑不白,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把握好黑白这个“度”,便是阴阳平衡之道。

方太——中国高端厨电领导者,也是践行以儒家思想管理现代企业的领跑者。方太掌门人茅忠群本人曾系统地学习过西方管理学思想,也成功利用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将方太从乙庚传统的家族企业打造成为一家管理严谨的现代企业。但是茅忠群并未止步于西方管理在制度流程上带来的好处,他认识到要实现方太“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的愿景,只有强大的企业价值观和文化才是根本。他认为任何企业文化都离不开本土的传统文化,一个业绩突出、发展健康的中国企业,需要中国文化的支撑,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支撑。方太从 2008 年开始,在茅忠群的带领下引入儒家文化,并在儒家文化中找到了适合方太的价值观。茅忠群本人非常推崇儒家文化,他曾专门学习国学课程,并将所学所思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他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写进了公司的价值观,号召公司高管以身作则,带动全体员工遵循儒家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在儒家“五常”基础上发展出方太的“五法”:廉耻勤勇严。在推行“方太儒道”近十年之后,方太已经通过儒家思想实现了从企业使命、战略、经营策略、管理方法到企业文化的深刻蜕变,儒家“仁义”理念在一家以西方管理为工具的现代企业中得以重现。茅忠群在为方太重新锚定“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的愿景之后,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把他所感悟到中国管理思想传播给更多企业家。

从佛教中找到内心精神寄托的王卫,是民营速运行业翘首顺丰的创始人。信仰佛教的王卫,他的顺丰王国在组织管理上不可避免带有佛教的色彩。因为佛教信仰的影响,王卫对自身的成就和企业的成功,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人的成就和本事没有关系,与福报有关系”,人能决定的只有做事的态度和是否接受正念”。王卫认识到佛教中很多旨在帮助世人树立“正知、正念、正行”的公案故事,具有很好的教益作用,通过这些佛理故事能够给人一个正念,一个积极的人生观、

价值观,进而通过接受者的一言一行传播开来。这在王卫看来是比直接授人以鱼、予人钱财,功德更大的事情。他曾写道“企业文化做得好,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爱好中国武侠小说,并在阿里巴巴公司为自己取花名为“风清扬”的马云,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智慧的爱好者。他兼取儒释道都看,曾说“在中国古老的文化里面,从太极哲学里面,我感受到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在他看来阴阳构成的太极,其中蕴含的阴阳、盛衰和变化,贯穿了整个企业运营管理上的哲学。在对传统哲学和智慧长期思索基础上,马云为阿里巴巴提出了一套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进行以其感恩和敬畏为价值核心的企业信仰,设计整个公司的所有管理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与智慧,不仅被中国本土企业运用,在台湾、日本的企业中也有很多推崇实践者。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很大影响,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最推崇老子的管理哲学,在松下公司总部的花园里立有一尊老子的铜像,铜像石座上刻着中文:道可道,非常道。

结 论

我们必须打破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缺乏理论构建的窘态,中国智慧哲学则是打破这一窘境的金钥匙。观照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可谓尽得天时地利。目前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两种重要倾向,一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都相继进入了各自的危机阶段,许多西方学者都在对此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二是后现代思潮的涌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打破工业化给社会带来的单一化和标准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方兴未艾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正朝着中国传统哲学方向靠拢,即循着“道”、“阴阳”和“悟”的方向前进。

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弊端是倾向于建立一个单一排他性的理论体系,而我们最终的理想模式并非同质普适性的模型,而是主位与客位对立统一的整合框架,类似于一个异质同构的马赛克范式。我们特别强调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在将中国传统哲学与古为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本土管理实践,与西方哲学及管理理论对话,进而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体系,最终形成作为全球管理主要学派之一的中国管理学派,与世界其它重要学派建立相生相克的竞合关系。

成熟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应用于有关西方现象的研究,并且影响西方未来管理研究的走向。我们提倡从中国独特的思维视角,提出中国独特的概念和理论,对世界管理发展做出中国独特的重大贡献。我们由衷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衷心祝愿中国所有学者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方面取得优秀的成绩。